

这个春季有些特殊,大部分高校的师生们都在忙于在线教学,但也有学校另辟蹊径,中山大学中文系就留下一张书单给学生,希望他们在疫情期间进行深度阅读。

不过,学生的阅读与学习时间,正在被动漫、短视频、游戏等娱乐项目割裂。这张书单面对着怎样的阅读现状,又将如何挑战被割裂的碎片化时间?



一张书单的使命与挑战

■本报记者 袁一雪

疫情肆虐,为保证课程进度,在线教学成为各高校不二选择。

但是,也有学校另辟蹊径。中山大学中文系就没有给教师和学生安排网络授课,只是留下了一张书单。其中,大一学生侧重 100 种文学经典书目的阅读,大三、大四学生侧重 50 种理论经典的阅读,大二学生则兼顾文学经典与理论经典。同时,学校提出学习建议,将写作类学习计划向前调整,如“大一作文”“大二书评”“大三学年论文”“大四毕业论文”,并集中落实“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荐阅读书目”。

至于学期课桌上的课程,中山大学则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搜索国内其他高校的免费人文社科公开课视频合集进行学习。

中山大学的这一举措,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

谁动了经典阅读的“奶酪”

曾几何时,经典阅读本是大学生的分内事,但如今为何成为“被叫好”的现象? 2019 年,一项关于上海市大学生阅读的调查或许可窥一斑。在这项“2019 新时代上海大学生经典阅读指数”的研究中,调查者从 3450 份有效样本中就阅读素养、阅读动机和阅读行为三方面,对上海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现状进行测评。该调查认为,上海大学生的传统文化基本阅读能力中等,综合阅读能力偏弱,在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上需要更多专业化支持。

这项调查虽然以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阅读为主,但仍可反映出他们在阅读方面令人忧虑的一面。

对于这种现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胡晓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无奈地表示,一方面,对于经典,“教师要求才读,而非自己对于阅读经典书籍感兴趣”,这在高校,哪怕是以人文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上学期间本该用来阅读的时间,却正在被动漫、短视频、游戏等娱乐项目蚕食。2019 年 6 月,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北京贵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布了一组在校大学生洞察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大学生平均使用 27.1 个 App。从类型上看,在校大学生主要把时间花费在了社交、视频、手游上。其中,手游使用时长为 2 万分钟,即 330 多小时,仅次于移动社交与移动视频。

胡晓明在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性图景》的文章中提到,“游戏世界,打打杀杀、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迎合人性的本能冲动与野蛮血性,充满向下沉沦的娱乐至死的颓废,甚至,表面是英雄崇拜或励志人生,骨子里却是顺承人性的自然倾向,强权即真理,自我即天意。久而久之,参与构建了人性的黑暗图景。”

在胡晓明看来,这意味着“动漫文化有了根,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年轻人生长的精神食粮”。“这首先是人性的问题,其次才是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人性总的来说是趋利并贪图享乐的,经典作品不是顺着人性的习性,而大都是逆着人性的习性。”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乱花渐欲迷人

眼”,学生的注意力被过度分散,也是不争的现实。“人生有限,以有限的时间,花在碎片的信息与花样的浏览上,当然不利于系统知识的学习。一次有个学生问我,到图书馆的学生都不是看书,而是看手机,你如何看这个现象? 我说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后阅读时代的生存方式,纸质书争不过一个时代生存方式的重大改变。”胡晓明坦言。

无论如何强调深度与系统化阅读,如今的阅读时间都被割裂。而如果一直进行碎片化阅读,胡晓明认为,人会缺乏深度思考。“由此会出现浅碟子的思维和即时反应的思维,就像在微信上的发言都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还会产生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只听某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因为微信群只是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的群,相互洗脑,共同成全‘单面人’。如果只懂技术而缺失人文思想,那么他可能会是个‘空心人’。在这个时代,没有深度思考的人或许还会成为‘娱乐至死的纵欲者’。”

普通人的碎片化阅读尚可接受,一代大学生如因碎片化阅读变成“空心人”,对整个民族来说都将是一种不幸。胡晓明认为,这种情形在高等教育领域必须引起重视。

拯救碎片化阅读的可能途径

显而易见的是,手机的碎片化阅读并不能替代系统阅读经典书籍。在人的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经历,如果他阅读的书目足够多,或许人生的长度没有改变,却拓展了人生的宽度。

“书籍其实是无数条同时存在的逻辑、标准和推演过程,作者在写作之时,以某一个瞬间的、明悟式的东西最终呈现出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姜振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让学生去接近、理解和批判阅读的内容,那么此前他们来自生活的逻辑前提、预设标准,就都将在阅读和思辨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

姜振宇曾经在学校里开设过一门“写作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他认为,阅读与写作,前者是输入,后者是输出,如果将两者放在人格塑造层面上看,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过程。“人格塑造,恰恰是所谓‘文科’,甚至可以说是中文专业的终极目的之一。”

姜振宇表示,“当然,阅读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这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具有完整的知识和技能系统的学科相比,差别很大。学生无法通过或简单或复杂的培训、练习上手操作,而是需要个人的感悟。”

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与其说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倒不如类比成一种孤独的‘修行’”。可以说,真正建立人生的宽度,绝非轻而易举,而在大学生时代大量阅读,未尝不是一条必经之路。

胡晓明也认为,任何真正的人文主义的艺术素养,都应该在个人经验、生命体悟与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换句话说,艺术教育,绝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与专业的事情,而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与记忆、回想、直觉、想象力、感受性、细节、梦思、幻觉或激情以及诗歌意象与戏剧感等个人心理

形式相联系而完成的,从艺术本身去学艺术,往往学不到真正的艺术。”

正如怀特海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里所说,尽管古典文学艺术的才能成为能力的代名词,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以古典文学艺术为主要基础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愉悦和品德修炼,已为近代几百年以来的经验所证明。

“然而,这样的古典教育,必须从特定的、对个人理解来说是具体而明确的事实开始,必须逐步发展成为一般的思想概念。”胡晓明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段怀清提出的解决思路是“顺势而为”。他认为,既然碎片化的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实际存在的事实,那人们就需要从这样的阅读当中逐渐改进提升,将碎片尽可能地黏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碎片或能够彼此连接的碎片,逐渐克服完全的、彻底的碎片化趋势。

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阅读者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与自觉意识。但对年轻的大学生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建立这种明确的认识与自觉意识,那么,一个“更有计划亦更有目标地补充、丰富和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阅读书目表”,就必须借由学校和教师们的力量来提供。

段怀清并不担心经典从生活中远离,“因为在国人成长的教育中,充满了零碎的与经典文本、经典思想或经典话语相关的‘语录式’教育”。例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孩子来说,或许并没有完整地阅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但对“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极高明而道中庸”“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以及“恻隐之心”等词句却是熟悉的。

“这种源自于生活、服务于日常的语录式教育,构成了中国孩子与人文经典、文史传统之间一种较为特别的言语—文本—思想”的共有关系,尽管他们对于这种关系极有可能不自知。”段怀清说,“这种关系,是人与文史经典或经典文本之间关系的实际形态之一。同时,这种关系在人们讨论今天的大学生或社会读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时,又往往容易被忽视。”

段怀清认为,上述这种关系在随着人们成长的同时,也要“成长”。要让经典文本真正发挥出经典思想、经典价值、经典审美以及经典信仰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知识性的记忆层面与形态,“经典文本的阅读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形成相对一致的文化记忆、价值认同以及信仰坚持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阅读不分文理而关乎人生

为了鼓励学生多阅读,老师们也是绞尽脑汁。目前身在大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传媒学院助理教授陈震,今年负责“西方媒体中的中国”课程。线上课程开始之前,他已将参考书目推荐给学生——美国人史景迁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伊佩霞的《剑桥中国史》,以及与影视相关的《从傅满洲到功夫熊猫:美国电影中的

中国形象》。“因为学校是全英文授课,而且课程是看西方媒体怎么展现中国、怎么报道中国、怎么书写和解读中国,所以我推荐了这几本英文书籍。”

“人文学科很多知识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这些书出自政治学者、史学家和电影研究学者之手,也拥有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背景。”陈震认为,多元的书籍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还会引发争鸣。“但共鸣与争鸣的产生都建立在学生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只有学生阅读量足够大,才能更全面地、批判地看待不同观点,以及其背后的认知角度和价值取向。”

不只是文科生,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吴超也在他的网络课程中鼓励学生多阅读,“阅读是能力,而且是终身需要的能力。这一点不分文科和理科”。

吴超认为,理工科学生不太爱阅读社科类著作的原因是,中学文理分科,高分学生多读理科,形成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理工科学生忽视文学,造成许多人写作能力低下,哲学层面的积累就更不用提。“哲学层面的要求只能待学生有较丰富的阅历以后,才能认识到哲学是更大的学问,理工科很多东西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吴超说。

对此,姜振宇也认为:“学什么专业、学得有多好,并不会对人格如何发展有太多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阅读恰好是专业知识之外,让大学生人格变得‘丰富’起来的一条捷径。它很便宜,而且门槛很低,真正阻止一个人去阅读的,大多数时候只是他自己而已。”

“专业学习是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但究竟应该如何结构性地规划和生成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学习过程,其中是否应该设计一些既有人文传统,又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经典文本的阅读计划,来辅助在校大学生的课外阅读,甚至在导师们的适度引导之下,有一定计划地开展阅读和讨论,以推进在校大学生对于中外经典文本、经典思想及经典文化的阅读学习,显然是一个更有意义亦更有现实性的课题。”段怀清认为。

阅读将不同学科构建在同一话语体系

除了让人生变得充盈,阅读还有助于打破文科与理科的壁垒,为两种思维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陈震解释说,在语言学、传播学中有“媒介素养”的说法,“也就是不仅要把文本作为知识,也要了解知识形成和传播的机制,所以‘素养’也包括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但现在专业分野越来越明显,“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在专业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过分强调分野对于学科间交流也有寒蝉效应。”

不过,近年来,学术界鼓励 and 强调跨专业和跨专业共同协作,以解决现实中棘手的问题和应对复杂的挑战。“广泛的跨学科阅读,可能给平时专注于专业研究的人士,提供一些视角上的启发。”陈震说。

“而且,阅读基础本身也是话语的一种构建。”陈震举例说,新闻媒体在进行“有限人传人”“Ro”等流行病学的术语报道时,需要向大众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让人更理解其中的含义,“此时的报道是阅读,也就是搭建文理、普通人与医学专家之间的桥梁”。

那么,如何真正开始阅读? 陈震建议,打基础要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开始,读的时候多与师长、朋友讨论,勤做笔记。至于理科生,他发现网上有不少善于用平实的语言,分析总结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等期刊文章,进行科普传播的人。“对于具有本学科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可以读一些科普文章和通俗写作文章,学习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和文字影响身边的人。对于理科生,很多理科朋友喜欢读哲学和科幻方面的书,在科学攻坚高寒处突破极限时,常常需要超越、形而上和文学艺术的滋养。”

相较于纯文学,“理工科教材编写方式都有固定程式,浏览一下全书目录就知道各章节内容,需要先读或重点读哪部分很快就能找到,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进行学习,而不像文学小说,最终结局要看完全书才能明了。”吴超说,如果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或难题,可以停下来慢慢思考,之后再继续学习。

至于如何选择书籍,导师推荐的书单肯定是不错的选择。吴超建议:“人生最需要阅读的、最基本的书是安全、家庭、事业和社交这四方面的。现在提倡知识和学科大交叉,理工科学生需要多阅读社科类的课外读物,至少对社会、经济、法规、安全、环境、人文等有一些大概的了解,这也是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所要求的。”

而姜振宇关注到了大学生处于信息来源丰富的阶段,很容易产生“半迷茫”的状态,“就是不知道究竟去读什么”。“这一点对于缺乏通识教育概念的大学的理工科而言会更严重,实际上教师也不清楚应该推荐阅读些什么。”

“其实,关键是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意识到,大学是人生旅途中距离各种大师或站在思想界顶端的人最近的地方,此时读书拓展的是精神边界。”姜振宇说,“我会推荐学生去读在各种网络或线下听说过但没有真正接触的读物。不要怕读不下去,也不要怕读到‘坏书’。反正图书馆对大学生敞开,不妨多读一些。”

中国大学评论



张端鸿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3 月 21 日,科技部公布《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要求在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的项目中扩大博士后岗位规模,其劳务费用和有关社保补助按规定从项目经费中列支。其实,高校通过高薪吸引博士后的做法已屡见不鲜。在最近的博士后招收公告中,苏州大学甚至推出百万薪酬的博士后岗位,远超绝大多数高校在编教师的薪酬,引起热议。

从组织需求的角度来说,博士后流动站是培养和储备高级科研人才的重要组织形式。李政道先生曾两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我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取得博士学位只是高层次科研人才培养过程的一环,青年博士需要在成熟的科研团队中进行历练,才能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和具有学术领导潜力的科研人员。

从个体需求的角度来说,博士后经历是青年博士为未来学术职业生涯积累人脉、项目和成果的重要途径。博士后在流动站里从事科研工作,是一种科研经历,不是学历学位阶段,不是人才称号,更不是专业技术或行政职务。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协助所在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具有使用和培养的双重属性,跟合作导师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并不完全具有独立科研人员的地位。博士后的工作年限一般只有 2-3 年,从岗位属性来说是一种临时性岗位,工作期满后必须流动出站。在其获得固定工作岗位前,实际上处于流动状态,也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科研临时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其流动性强,薪酬待遇竞争力不足,博士后岗位的吸引力并不强。只有在第一时间无法找到满意科研岗位的博士才会选择这个过渡性的岗位,但这项制度还是为大量青年博士成长提供了必要的阶梯,整体上为我国积累和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很多科研人才通过这个过渡期挖到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桶金”,随后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科学家。

近年来,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教师岗位的起点要求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高校参照国际惯例,将博士后经历作为助理教授或讲师聘用的重要前置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博士在求学阶段的科研经验和科研成果积累仍有所不足,通过博士后研究经历,能够更好地提高青年博士的科研经验和科研能力,也能更好地检验他们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产出。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校陆续为博士后开出了 20 万、30 万、50 万、80 万,乃至 100 万元“节节高”的薪酬。但我们也注意到部分高校在执行人事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的现象。有些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在进行师资应聘资格审查时,直接将应届博士生或项目、论文等产出数量不足的青年科研人才拒之门外,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入专业评审或同行评议阶段。但实际上,仍然有部分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都非常好的应聘人员,符合高校学术发展的需求,高校人事政策应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进入通道。

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和高校在博士后队伍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定位上的偏差。首先,部分地方和高校将快速甚至超速扩大博士后规模作为提高科研产出的捷径,让受聘博士后拿到高薪酬,也所以在高校的名义留下一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项目和核心期刊论文。这样一来,这种博士后薪酬体系就成为了项目和论文的变相“赎买”政策。有些高校率先行动尝到了甜头,更多的高校正在竞相跟进模仿。其次,部分地方和高校根本就没把博士后的薪酬,为扩展高层次人才规模提供了有力工具,却冲击了正常的教师队伍管理秩序。大量的在编教授、副教授薪酬还不如博士后,却是高校一线教学、学生指导的主要力量,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心思变。再次,由于单纯的高薪酬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有限,有些高校就对博士后做出“高比例出站留校”等可能无法兑现的承诺,最终导致了各种管理上的混乱。

博士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制度。研究型大学建立和完善这项制度,有助于不断完善科研人员进行队伍体系建设。但高校也需要认识到博士后队伍是高校主干教师队伍的必要补充,国家扩大博士后队伍的政策是要强化这支辅助队伍对主干队伍的支撑作用,不能用这支辅助队伍来冲击主干教师队伍。博士后流动站建设重在发挥科研人才培养和储备的功能,不能异化为科研指标的“赎买平台”。只有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才能更加可持续地发挥博士后队伍在高校科技工作体系中的作用,使得这支队伍对整体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具有支撑作用,避免成为短期的高校科研政绩工具。

莫让博士后成短期科研政绩工具